

“物我交融”与“物我相隔”

——陶渊明与华兹华斯自然诗的观物方式比较

许辉

(文山学院中文系, 云南文山 663000)

摘要:陶渊明和华兹华斯, 一个代表中国晋宋之际田园诗的顶峰, 一个是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的丰碑, 两位诗人都崇尚自然, 返回到了自然之中。由于二者对自然的理解不同, 观物方式也大相径庭, 一个以物观物, 达到了物我交融的境界, 一个以我观物, 造成了物我相隔。究其原因, 源于他们的相异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不同思维方式, 即西方文化是从分析的角度来对待自然, 而中国文化很大程度上是用综合的方法去理解自然。

关键词:陶渊明; 华兹华斯; 自然诗; 以物观物; 以我观物

中图分类号: I207.2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00(2012)05-0063-05

在人观赏物之前, 人与物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关系。当人凝视外界时, 便产生了物我关系。所谓“观物方式”, 就是诗人观照外物时所采取的态度, 由于态度的不同, 从而产生出不同的物我关系。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 “有有我之境, 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 乱红飞过秋千去’, ‘可堪孤馆闭春寒, 杜鹃声里斜阳暮’, 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寒波澹澹起, 白鸟悠悠下’, 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 以我观物, 故物皆着我之色彩, 无我之境, 以物观物, 故不知何者为我, 何者为物。”^[1](P371) 那么, 陶渊明与华兹华斯在面对外物时, 是以何种角度去观照的, 是以物观物, 还是以我观物?

一、陶渊明: 以物观物

如《饮酒》其二: “结庐在人境, 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 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 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2](P35-36) “心远地自偏”一句尤耐人寻味。“远”与“偏”相对, 大有心底无私天地宽或无欲则刚之意。虽然身处喧闹的人世, 但心灵的超脱使自己有了一份难得的宁静。而“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一句受到历代评论家的赞赏, 最能表现陶渊明对自然的观照方式。在这里, 陶渊明创造了一个见物不见人的境界。正因为“心远”, 故能摆脱世俗的束缚, 拥有一份悠然: 有了悠然之心, 而后才见南山; 而不是见南山之后才感到悠然,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审美表达。叶维廉在《中国诗学》中曾说, “风折之笋垂

绿”是经验过后的结论, 而不是经验当时的实际过程。“绿垂风折笋”是涌现的直接, 是视觉过程的把握, 是先“感”而后思。“风折之笋垂绿”是事件发生之后的结论, 是思“含”在感内。^[3](P21-22) 在此, 借用叶维廉的观点来感悟陶渊明的这句诗再合适不过了。“悠然见南山”这是经验当时的实际过程, 是南山作为一个具体事物的涌现, 是整个悠然心境活动的一个发生, 这甚至不是概念和意义所能包容的, 这更多的是一种直觉或顿悟。因此, 在陶渊明诗中, 我们不知何者为我, 何者为物, 物我的界限冥合为一体, 是一种先“感”而后思, “思”所占的比重较小, 并不阻碍景物的涌现。可以说, 陶渊明很好地处理了诗人与自然的关系, 淡化物我之间的距离, 达到了物我浑融一体的境界。他既不是自然的奴隶, 也不是自然的主人, 而是自然之子。他的诗就像一盏灯, 没有太多自我的痕迹, 却无不关照。这样的无我, 却照亮了澄明之道: “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一个无言境界自然涌现。“我”在诗中并不彰显, 也不去作太多的辩解, 可“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 达到了庄子所说的“丧我”之境界。因为自我已化为大地的一个成分。或许, 诗人的隐退恰恰成全了诗的彰显。就像演奏一首乐曲, 太注重自我的表现反而会忽略音乐本身的美感。正如宗白华所说: 艺术境界在人生忘我的一刹那, 万事自得须静观, 陶渊明忘我故能成其为境界。

又如《时运》: “迈迈时运, 穆穆良朝。袭我

收稿日期: 2012-08-16

作者简介: 许辉(1975-), 女, 云南文山人, 文山学院中文系讲师, 硕士, 主要从事文学理论教学及研究。

春服，薄言东郊。山涤馀霭，宇暖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2](P17)}诗里说：四时不停地运行，又是一个和煦的春天的早晨。穿上我的春装，来到东郊野外。山上的雾气渐渐消失了，仿佛荡涤如洗，天空中隐约出现雨后的彩虹，一阵南风拂面而来，新生的禾苗如张开的翅膀。这首诗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天真、喜悦的画面，不仅有山有彩虹有风有新苗，还有一位穿上春装的诗人。诗中所写的山、彩虹、风、新苗不因人的存在而存在，具有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诗人此时已完全摆脱思想的羁绊，对眼前之景作凝神的注视，并凭借敏锐的观察力，感应自然生命的节奏，自然与人之间有了一种情感交流，我融入大自然，大自然也融入我心中，诗人的心与自然融为一体。“有风自南，翼彼新苗”一句写得最有妙趣，写出了“风”和“新苗”的生机，“翼”字写出了性情。这是一种顺应自然的性情，神与物游的境界。诗中的自我深藏不露，让景物自动敞开，自由地涌现，呈现出一片和谐。自然万物，各随天性，消长生息，莫不自自然然。因此，此诗中的人和万物是平等的，无轻重先后之分，已达到心与物相化的状态，是物象和场景的自然与人心的自然的融合，心灵因此处在一种自由的状态，达到了王国维所说的“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词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4](P365)}之意境。

总之，中国古代诗人在山水诗的创作中大都采取一种“以物观物”的观照方式，作者不以主观的情绪或知性的逻辑介入去扰乱眼前景物内在生命的生长与变化，力图以自然自身构作的方式构成自然，以自然自身呈现的方式呈现自然。^{[5](P181)}因此，陶渊明亦然。因以物观物，不把“我”放在观照的主体地位，达到了郭象所说的“物各自然”，万事万物都是自生自长，就像孩子对母亲的爱或“春来草自青”那样自然而然，根本不需要任何太多的思考介入。

二、华兹华斯：以我观物

由于中西方对“自然”的理解不同，使得诗歌在表现自然时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与中国古代诗人的以物观物方式不同，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则以我观物，将美感的主位放在诗人的智心中，以智心的活动而不以山水景物自足的存在为依据。^{[5](P181)}当然，华兹华斯也不例外。如《我独自游荡，象一朵孤云》写道：

我独自游荡，象一朵孤云
高高地飞越峡谷和山巅；
忽然我望见密密的一群，

是一大片金黄色的水仙；
它们在那湖边的树荫里，
在阵阵微风中舞姿飘逸。

象银河的繁星连绵不断，
辉映着夜空，时暗又时亮；
水仙就沿着湖湾的岸边，
黄灿灿的一片伸向前方；
我一眼望去便看见万千一
一边欢舞一边把头频点。

水波在边上欢舞，但水仙
比闪亮的水波舞得更乐；
有这样快活的朋友作伴，
诗人的心儿被欢愉充塞；
我看了又看，却没有领悟
这景象给了我什么财富。

因为有时候，我心绪茫然
或沉思默想地躺在榻上，
这水仙常在我眼前闪现，
把孤寂的我带进了天堂—
这时我的心被欢乐充满，
还随着那水仙起舞翩翩。^{[6](P256)}

这首诗从描写水仙入手，由一望无际的水仙的鲜亮色彩与不断跳动的情景展开联想，诗中的水仙已不单纯是水仙，而是一种快乐的化身，诗人借这样的景来抒情，更借这样的景来说理。人与水仙经过短暂的精神交流及诗人得到某种哲理启示后又各自回到两个不同的世界中去。人还是人，水仙也依然是水仙，水仙与诗人之间存在着离析的裂痕，并没有达到物我交融的境界。“我看了又看，却没有领悟”这里的“看”与“悠然见南山”之“见”体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物方式。华兹华斯始终作为一个旁观者，站在桥外看风景，总在思索“这景象给了我什么财富”这一问题，而无法达到陶渊明那样无心插柳成荫的佳境，华兹华斯是有意为之，陶渊明则无意得之，真是两种不同的境界。“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在这我们感受到了主体“我”的凸显。而唯有主体虚位，才可以任素朴的天机活泼兴现。^{[3](P54)}在华兹华斯的诗中，主体虚位的缺乏，使他只能以固定的一点进行观赏，不像陶渊明那样由于主体的虚位而不断变化角度，这类似于西方绘画与中国画的区别。前者为了达到其

艺术再现的客观性，方法上是运用立足于解剖学原理的“焦点透视”，后者则不讲究纯客观的透视，而习惯于运用“散点透视”。华兹华斯以我观物，导致“思”的痕迹阻碍了水仙的呈现。

又如《丁登寺》：

五年过去了；五度炎夏还加上
五个漫长的冬天！我又再一次
听见这水声音；这水从山泉流来，
在这远离海和内地潺潺作响。
我又一次看着这些危崖陡壁；
它们使这里幽僻荒凉的景物
更显得与世隔绝，还把地上的
风光同沉静的苍天连在一起。
今天我又能在这里躺下休憩，
在这黑压压的槭树底下眺望
这些村舍院落和森林的果园。
在这季节，果树和没熟的果实
披着一色绿装，同小林和树丛
混成一片。我又一次看见这些
树篱，可又不象是树篱，简直是
排排欢闹的小树在撒野；这些
门前只见葱绿的农家和寂静
树林中冉冉升起的团团青烟！
看来这隐约地表明：这林子里
虽没房屋，却住着漂泊的人们，
要不，某个住在山洞里的隐士
正坐在火边。^{[6] (P76-77)}

《丁登寺》的头22行，如果独立存在的话，确近乎自然山水未经解说的呈现，其间甚至用了一种毫无条件的爱和信念、不假思索的语态去肯定景物的存在，景物的出现也有某种程度的自然直抒：“这些”流水……“这些”悬崖……“这些”树篱。在他承接景物的直抒时，甚至有近似王维的入神状态。但跟着的140行，他全诗的四分之三，都在“说明”外物“如何”影响智心，或“说明”“智心”“如何”和外物交往感印，“如何”与自然互相补充。^{[5] (P185)}

如他接着写了自己在成长过程中对于大自然的反应的变化：孩提阶段：“那时我象獐子，让自己的天性带领着，在山上、在大河边上、在僻静的溪边，蹦蹦跳跳”；而到了青春阶段：“我童年时代不优雅的乐趣和飞禽走兽似的动作都已消失”，对大自然的爱变成“令人痛惜的欢乐、令人眩晕的狂喜”；而现在到了第三个阶段：

我学会重新
观察自然；不再象头脑简单的
年轻时那样，而是经常倾听那
无声而忧郁的人性之歌。这歌
柔美动听，却有着巨大的力量，
使心灵变得纯洁宁静。我感到，
高尚思想带来的欢乐扰动了
我的心；这是一种绝妙的感觉
感到落日的余晖、广袤的海洋、
新鲜的空气和蔚蓝的天空
和人心这些事物中总有什么
已经远为深刻地融合在一起；
是一种动力和精神，激励一切
有思想的事物和思想的对象，
并贯穿于一切事物之中。所以，
我仍爱草场、森林和山岭；仍爱
这绿野上所看到的一切；仍爱
这个眼前的大千世界，
无论那是它们的半创造还是
直觉；我高兴地在自己天性和
感官的语言中认出系住我最
纯净思想的锚，认出我心灵的
保姆、向导和护卫，还有我整个
精神世界的核心。^{[6] (P80)}

如果说《丁登寺》中的诗人5年之前接触的“美丽的形象”给他以力量，帮助他度过了在城镇之中的“消沉时光”。在认知层面上，这种基于感觉的情感方面的支撑价值仅能“使心灵纯洁而已”，那时，自然景物仅仅满足诗人的一种“欲望”、一种“感觉”，停留在视觉、本能和情感层次上，与思维没有太大关系。那么，5年之后，大自然不再完全独立于诗人心灵之外，大自然中的景物被转化到思维之中。诗人在经历了前两个感性阶段之后，终于从大自然中得到了一种精神。可见，自然成为表示反思、推理和道德这类概念的支点；诗人在大自然中发现了纯净思想的锚，“认出我心灵的/保姆、向导和护卫，还有我整个/精神世界的核心”。

他在《序曲》中曾说：“可见的景象/会不知不觉地进入他脑中/以其全然庄严的意象。”但他并没有真正做到。华兹华斯在《丁登寺》中通过描写自然山水表达了无论在何种时间，在何种环境之下，回想起自己曾有过的与自然的交往都能有一种归家的感觉，并描写了如何在景物中感到崇高的思想融合着雄浑，自然如何使他“最纯洁的思想得以下碇”。

但他又认为,“物象的影响力的来源,并非来自固有的物性,亦非其本身之所以然,而是来自与外相交往、受外物所感染的智心所赋出的,所以诗……应该由人的灵魂出发,将其创造力传达给外在世界的意象”。^{[5](P191)}因此,华兹华斯强调以智心去领悟自然之景,以智心的活动而不是以山水景物自足的存在为依归:华兹华斯虽把山水用作主要的美学素材,但他有意无意间要设法为山水所能扮演的角色“明辨”,说明它们可以如此存在的理由,其结果之一是:诗人将原是用以形容上帝伟大的语句转化到自然山水来。其结果之二是:诗人常常有形而上的焦虑和不安。因为他认为“纯然感受外物是不足的,真正的认识论必须包括诗人的想象进入本体世界的思索,必须挣扎着由眼前的物理世界跃入形而上的世界”。^{[5](P198)}因此,他更多的是把自然作为一种抒发情感和表达思想的媒介,《丁登寺》中更多的是解说性、演绎性的语言。卫思林在论《丁登寺》时也说:“在《丁登寺》一诗里,那种仿佛不定的探索思维穿过知性的活动而使诗开头的山水景物的描写加深……华氏的特色是:山水与一连串的概念程序是分割不开的。”^{[5](P192)}所以,自然景物本身并没有成为他诗中审美的主体。

因此,由于华兹华斯始终并未抛弃自我,不可能与天地为一,物因人的存在而存在,从而使景物的具体性渐因作者介入的调停和辩解而丧失其直接性。^{[5](P186)}

三、结语

陶渊明与华兹华斯观物方式的不同,在于他们的相异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不同思维方式。季羨林先生在《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一文中指出:“东方的思维方式,东方文化的特点是综合;西方的思维方式,西方文化的特点是分析。”^{[7](P19-20)}在这一论点的前提下,我们可以进一步指出,西方文化是从分析的角度来对待自然,而东方文化很大程度上是用综合的方法去理解自然。因此,陶渊明与华兹华斯诗中呈现出不同的观物方式,即前者以物观物,后者以我观物。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以“天人合一”思想为主。儒道两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构成,可以反映中国文化的特色。儒家认为“天之根本性德,即合于人之心性之中”,这是把与自然和谐相处引伸到社会伦理道德之上,注重人与社会的和谐。而道家才真正走上了人与自然合一。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可见老子的天地是完

全不分主客的。而庄子把这一境界描绘得更为形象:“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在庄子的眼里,整个宇宙是有机的整体,身处其中的人首先应当仔细体悟人与万物的和谐境界,而不是凭借理性来揭示事物的本质。但无论是道家的人与自然合一,还是儒家的人与社会合一,在主客浑然一体这一点上是相一致的,只是着眼点不同而已。这种思想意识深深植根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与审美心理结构中,尤其对山水田园诗人的审美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陶渊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中成长并走向成熟,不可能不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陶渊明的思想丰富复杂,李泽厚先生认为:陶渊明的思想是儒道互补的,但道的成分更多更明显一些,“正像杜甫比较完满地体现了儒家精神一样,陶潜则比较完满地体现了道家精神”。^{[8](P68)}因此,在“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下,陶渊明习惯以综合的思维方式去领悟自然,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从而呈现出以物观物的方式。

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以“天人相分”思想为主。这一思维倾向早在古希腊就已经出现。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把人放在宇宙的中心地位。柏拉图提出了理念说,他认为,感性的具体事物不是真实的存在,在感性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理性世界,从而使理性世界与感性世界二元对立。因此人们不应该满足于感性认识,而应进一步探究事物的本质。到了中世纪,自然成了神学的奴婢,人与自然仍是对立的。文艺复兴时期,诗人们开始摆脱神学的束缚,描绘和歌咏自然,但自然仅作为背景而已。之后的17世纪后半叶,日益成熟的机械论哲学在欧洲的影响越来越大,神学的束缚日益减少,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表明,人已经充满了征服自然的信心。启蒙主义者进一步追求自然之美,而自然始终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可以看出,从古希腊至18世纪末,认识论占了西方哲学和宗教的主导地位,主体始终凌驾于客体之上。在西方人眼中,“自然”是变化多端的,人们可以认识它,把握它,却无法用情感去体验它,拥抱它,从而形成一脉重理性分析的文化传统。西方人极力探寻事物的本质,其动力在于主体凭借力量去征服客体。在主客二分文化的影响下,西方人习惯以分析的思维方式去认识自然。

在浪漫主义之前的英国,情况也一样。虽然这种状况到了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有所颠覆,但正如佛勒·兰德在他的《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

米修斯)的浪漫诗中的山峰》一文中指出的,浪漫主义诗人对于用被动的态度去接受自然景物这一点一直都质疑,这种质疑的不安可回到1335年,彼特拉克·裴特勒克在亚维农附近的一个山顶上 Mount Ventoux 因为曾沉醉在一片纯山水的景色中而感到内疚,因为他记起,人的灵魂绝对应该是人们赞赏的目标,而非外物。在浪漫主义诗人中,柯勒律治进一步发展这个题旨而使后来的诗人为此焦虑:“不知人的灵魂应该全心地沉入孤独和雄奇呢还是应该参与社会和伦理的交感里。”^{[5](P194)}因此,虽然华兹华斯在诗中努力去弥补人与自然的分离,但仍是“我”占了主导地位,采取的是以我观物的方式。

总之,华兹华斯与陶渊明的观物方式大相径庭,一个以我观物,造成了物我相隔,一个则以物观物,实现了物我交融的境界。

参考文献:

- [1] 王国维. 人间词话 [A]. 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 [2] 谢先俊, 王勋敏, 译注. 陶渊明诗文选译 [M]. 成都: 巴蜀书社, 1990.
- [3] 叶维廉. 中国诗学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 [4] 王国维. 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 [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1980.
- [5] 李达三, 罗钢主. 中外比较文学的里程碑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 [6] [英] 华兹华斯. 华兹华斯抒情诗选 [M]. 黄杲炘,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 [7] 季羨林. 21世纪: 东方文化的时代 [A]. 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新论 [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8] 高建新. 自然之子——陶渊明 [M].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3.

Melting Ego and Things and Separating Ego from Things: The Things-viewing Comparison between Tao Yuanming's and Wordsworth's Natural Poems

XU Hui

(Chinese Language Department, Wenshan University, Wenshan 663000, China)

Abstract: Tao Yuanming and Wordsworth, the former being an idyllic representative of the Chinese Jin and Song dynasty, the latter being a monument of the 19th century English Romantic, respect nature and return to the nature. Their physical views are different because their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f nature, the former being a physical view of things and blending ego and things, the latter being mental view of things and resulting in the separation of ego and things. The reason stems from their distinct cultural context, different way of thinking. Western culture treats n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nalysis while the Chinese culture largely from an integrated approach.

Key words: Tao Yuanming; Wordsworth; natural poems; view things with things; view things with ego

(责任编辑 田景春)